

最早拜访巴黎圣母院的中国人

“四月一日与吴恒勤、张弦、汪亚尘、室人张韵士、儿子刘虎游巴黎拿脱大姆大寺。寺傍先纳河分水处。为大地建筑之久而壮丽诡异者。建于一一六三年。一一八二年行奉献式。本寺成于十二世纪。其后频加修改。迄十九世纪未完成。前后互八百年之岁月。经多数名师之设计。故为惊人绝作。……”

这是1929年7月4日,《申报》上刊载的《欧洲游通信(五)》,作者是著名画家刘海粟。

所谓“巴黎拿脱大姆大寺”,即巴黎圣母院,在中文报刊中,这是目前能找到的、最早的关于巴黎圣母院的记录(此前有对雨果小说《巴黎圣母院》的介绍)。

上个世纪20年代,对赴法华工、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而言,巴黎圣母院是地标性建筑。然而,说到国人首度拜访巴黎圣母院,比这还要早上200年。

□据《北京晚报》



1687年3月,沈福宗到英国,英王詹姆斯二世获悉后,邀其出席宫廷宴会,并委派著名画师戈弗雷·奈勒爵士为他绘制了一幅全身油画像,画像约在1687年六七月份完成,其后悬挂于国王卧室,该画现由英国王室收藏。

1 首位留欧生只活了40岁

明末清初,大量西方传教士来华,东西方交流空前繁盛。挑选中国人去欧洲深造,成为热门话题。

首位被选中赴欧的是郑玛诺,他是广东香山澳人,字惟言,生于1633年。他的父亲与法国耶稣会士陆德交好,陆德也是郑玛诺的施洗人。

据学者谭树林先生钩沉:1645年,陆德带郑玛诺赴欧。郑很有语言天赋,在亚美尼亚待了6个月,便能“与当地谈吐无异”。过土耳其时,他曾被蒙古人拘押,靠一口流利的亚美尼亚语获释。跋涉5年后,郑玛诺于1651年到了罗马。

1666年,郑玛诺在得到葡王召见后,从里斯本回国,因杨光先得到鳌拜支持,排斥教徒,郑只好暂留在印度果阿。教案平息后,郑玛诺先在澳门学了1年中文,后到广州,再到北京,1673年5月死于肺癌,年仅40岁。

郑玛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欧学生,但他似乎没去过巴黎。

在郑玛诺之后30多年,又有沈福宗赴欧。

沈福宗是江苏南京人,生于1658年,父亲是位医生,与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交往密切。1681年12月,柏应理带沈福宗、吴历访欧。

2 法国国王为中国人打开喷泉

柏应理之行的背景是:当时耶稣会在华势力最大,该会是为应对新教挑战而成立,纪律森严,成员重视科学,相对宽容。其他会感到受排挤,便指责中国人祭祖、拜孔子属偶像崇拜,而耶稣会未坚持原则。

相关争论维持多年,耶稣会为缓解舆论压力,只好找两名中国人去见教皇,以展示其成果。

为把事办漂亮,耶稣会确定了5名候选人,最后选择了25岁的沈福宗和50多岁的吴历。没想到,船刚到爪哇便出了事故,3人只好在巴达维亚(今雅加达,当时被荷兰人占领)逗留了1年多。在此过程中,吴历变了主意,回国了。

柏应理与沈福宗搭乘一艘荷兰船,于1683年10月到了欧洲。

1684年9月3日,法王路易十四(即太阳王)接见了沈福宗,沈按中国礼节,对其三跪九叩。在此过程中,法王连说:够了,够了。

第二天,法王在用膳时,再度召见沈福宗,沈不得不再度向法王及其妃子展示使用筷子的技巧,法王特意让人打开喷泉,让柏应理和沈福宗欣赏,一般只在迎接使节或高级王公时,才会如此。当时法国正与葡萄牙竞争,路易十四准备派更多传教士去中国,即东进计划,所以厚待沈福宗。

为出版自己翻译的《四书直解》,沈福宗两赴巴黎,前后待了1年多。虽无记载,但按诸情理,他应该拜访过巴黎圣母院。

3 传递阴阳交替的观念

1687年3月,沈福宗去了英国,住了近1年。

在英国,沈福宗与著名科学家胡克多次对话。李约瑟认为,正是沈福宗将阴阳交替的观念传递给胡克,此后欧洲物理学开始根据波动概念来设计实验。

1688年初,沈福宗去了葡萄牙,并和3位德国传教士乘船准备回亚洲,正逢瘟疫,4人中只有斯坦波夫幸存,据斯坦波夫的报告称,沈在到达莫桑比克前一天(1691年9月2日)病逝。

其实,在郑玛诺和沈福宗之间,徐安珠、郭约瑟也曾到欧洲,当时南明危在旦夕,任命波兰传教士卜弥格为使者,到教皇处请求援兵。徐、郭二人在欧洲的事迹不详。

在沈福宗后18年,黄嘉略再度赴欧,几乎可以肯定,他曾去过巴黎圣母院。

黄嘉略是福建省兴化府莆田县人,生于1678年,他的父亲与西洋传教士何大化往来密切。7岁时,黄父病逝,黄嘉略被传教士卜于善收为义子,3年后,转随法国传教士梁弘仁学习。

1701年,就中国人祭祖等问题,耶稣会与其他会矛盾激化,引发中西“礼仪之争”,梁弘仁作为反对耶稣会的一派,也被教廷招至罗马。黄嘉略得以同行。

4 樊守义撰写欧洲游记

几乎与黄嘉略同时,1707年冬,山西人樊守义也到了意大利,并拜见了教皇,他还写了一篇《身见录》,被著名学者方豪赞为“实为国人所撰第一部欧洲游记”。

在文中,樊守义写道:“见教王,承优待,命阅宫殿内外房宇,几万所,高大奇异,尤难拟议;多园囿,有大书库,库列大橱,无论其藏经书之多,即书柜书箱,总难屈指开辟;迄今天下万国史籍,无不全备。”

樊守义后来去了葡萄牙、西班牙,是否去过巴黎,偏偏没有记录。归国后,康熙皇帝曾召见他。

据学者许明龙先生钩沉,黄嘉略自1706年起常驻巴黎,并于1713年4月与巴黎女子雷尼埃结婚,此时他被法国太阳王任命为中文秘书,负责编写《中文语法》等,法王还给他配了两名学者当助手,但工资很低。在黄日记中,写了很多“我们一点银子也没有了”“我们是名副其实的‘穷得紧’”“今天,面包‘少’了一点”。

在日记中,引号部分用的是中文拼音,黄嘉略常以此调侃,或记一些隐私性内容。

黄嘉略曾有机会回国,但梁弘仁病重,无法远行,加上“礼仪之争”令康熙大怒,清廷宣布禁教,黄只好滞留欧洲。

5 黄嘉略结识孟德斯鸠

1713年10月19日至12月5日间,黄嘉略在日记中8次提到“la Bray”(或L.B.),二人平均每周见一次,这些会见具有历史意义,因这位“la Bray”不是别人,正是大名鼎鼎的孟德斯鸠,当时他的名字还是拉布莱德,直到他的伯父孟德斯鸠于1716年4月去世,遗嘱将财产、职务和姓氏都交给他继承,“la Bray”才变成了孟德斯鸠。

系列对话促成名著《波斯人信札》的诞生,而《论法的精神》中与古代中国相关内容亦出于此。在孟德斯鸠之前,欧洲曾长期弥漫着“中国热”,学者们将清朝视为完美治理的典范,孟德斯鸠则揭破了这一幻觉。

1704年11月8日,黄嘉略参观罗马的圣额我略堂,写道:“其瞻礼之前后日子,西国之大小男女老幼,皆往圣堂中祈祷,或点灯点蜡之人往来不绝,极是好看,而乃正礼。非同吾中国,而两块禽兽之肉,呼神叫鬼祭之,亦不知其祖先归于何处,来于何处,祝祷又何人受之。”

可见,黄嘉略颇有反传统思想。

黄嘉略可能有肺结核,在罗马时已咳血,到1713年11月,旧病复发,又开始咳血。当时欧洲人认为吃肉能治病,虽经济拮据,他的夫人仍每天给他买肉吃。二人吵闹一生,但在自述中,黄嘉略写道:“上帝让我认识了他指定为我妻的那个女子,我敢说,她既合上帝的心意,也合我的心意。”

1716年10月,黄嘉略在贫病交加中去世,年仅37岁,身后留有一女。

黄嘉略的家离巴黎圣母院很近,步行只需几分钟。

异国建筑在中国史中留痕

在黄嘉略之后,杨德旺、高类思等人赴欧留学。他们都曾在巴黎长住,并与重农学派代表杜尔阁密切交流,后者曾提出52个问题,请杨、高归国后调查。杜尔阁将二人提交的回答以《向两位中国人提出的有关中国的问题》《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》为题发表,引起亚当·斯密重视,将其中一些观点引入《国富论》中。

1732年,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在那不勒斯创立了中国学院,又称文华学院,计划招收200名中国学童到欧洲学习,受清廷禁教影响,学院后来只好也收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学生。

1868年12月,文华学院被政府没收,此时已培养了106名中国留学生。1792年,马夏尔尼访华,苦于没有翻译,专门聘请了2名中国留学生同行。此前,乾隆也曾召见学成归国的中国留学生,打探欧洲消息。

东西方彼此遥望,互相好奇,又互相提防。

1917年至1918年,超17万名(一说20万名)华工来到欧洲参加一战,他们多受英国雇佣,却在法国工作。战后遣返缓慢,直到1921年,仍有1.7万名以上华工滞法,加上超2000名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留学生,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。许多社会活动围绕巴黎圣母院展开。

五四运动爆发后,中国劳工曾在巴黎圣母院附近为国内学生募捐。在1919年五六月间,共3万多华工参与抗议巴黎和会的活动。签约当天,华工们包围了中国专使的寓所,不允许他们出门,表示谁签约,“当捕杀之”。

巴黎圣母院虽远在异国,却在中国现代史中留下身影。